

「舊文新譯」導言

藤井倫明*

本期在「舊文新譯」欄介紹狩野直喜的兩篇文章：〈關於支那學研究的目的〉以及〈支那近世的國粹主義〉。狩野直喜（1868-1947）乃是近代日本具代表性的漢學家，同時亦是京都中國學派的開山祖師。他出生於明治元年，畢生致力推動日本漢學的改革，使其現代化，試圖建設符合時代的新的中國研究。高足吉川幸次郎（1904-1980）將狩野直喜明確定位為日本漢學（中國學）的「改革者」或「創始者」。他在剛設立的京都大學文學院任教，培養出武內義雄（1886-1966）、小島祐馬（1881-1966）、青木正兒（1887-1964）、倉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等日本近現代知名的漢學家。筆者認為二戰後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基本上是往狩野改革或創新方向前進、發展。在這個意義上，狩野直喜可堪稱為日本現代中國學之父。

關於狩野對日本漢學所作的「改革」或「創新」的主要內容，他的高足之一吉川幸次郎指出如下四點：¹

第一、歷來的日本漢學，往往將儒家古典作為道德倫理之類的書來接受、學習，但狩野脫離傳統漢學的這種古典理解，將它視為中國文明史研究上的資料，從純學術性的觀點進行客觀、實證性的研究。

第二、以文獻學為中國古典研究的前提條件，特別強調文獻學相

* 作者現任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¹ 參見狩野直喜：〈解說〉，《支那學文叢》（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年），頁500-502。

關知識的重要性。

第三、擺脫偏重明代學術的江戶時代以來的舊習，注重清朝當代的研究成果，試圖站在與同時代的中國學者相同的立場來進行研究。

第四、在傳統漢學中，往往輕視戲曲或小說等中國通俗文學，幾乎沒有人進行專門研究。但狩野將通俗文學視為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料且相當重視，開始對它進行學術性的研究。附帶而言，在日本，敦煌學這一研究領域也是由狩野開拓的。

總之，狩野擺脫歷來教條主義式的中國古典研究，將中國視為構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來研究中國古典。日本傳統漢學，因為中國文化在日本文化的形成上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日本的知識世界基本上是在漢學（中國古典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發展的，因此對日本人而言，中國古典雖然是來自中國（外國）的，同時亦可以說是屬於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若就這個脈絡下來看，其結果往往是失去將中國古典視為外國文獻的觀點，進而導致溝口雄三（1932-2010）所謂的「沒有中國的中國研究」。² 狩野的中國研究中，明顯看到將中國視為不同於日本的一個獨立的他者，遵照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從作為他者的中國的內部觀察、分析它的觀點。在狩野，傳統漢學作為近代式學術變貌，重新再生了。另外，作為狩野中國研究的特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倡「為了學問的學問」這一點。他激烈反對學術研究變成政治或為了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他的中國研究一輩子堅持「學問的獨立以及自由」這一立場。³ 考慮他生存於近代日本這種帶有濃厚的國家主義的環境當中，能夠貫徹主張並堅持這一學風，實屬相當可貴。

他的著作有《支那學文藪》（1927）、《讀書纂餘》（1947）、《中

² 參見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年），頁131-140。

³ 參見高田時雄：〈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頁26-27。

國哲學史》(1953)、《兩漢學術考》(1964)、《魏晉學術考》(1968)、《支那文學史》(1970)、《論語孟子研究》(1977)、《漢文研究法》(1979)、《御進講錄》(1984)、《清朝の制度と文學》(1984)、《支那小説戲曲史》(1992)、《春秋研究》(1994)。除了《支那學文藪》、《讀書纂餘》之外，其他著作都是狩野去世後編輯出版的。據吉川幸次郎指出，狩野生前堅持「身為教師，應該專注教學活動，講義優先著述」這一立場。因此，上列的著作幾乎都是他在大學講義或演講的紀錄筆記或草稿。

本期翻譯的〈關於支那學研究之目的〉以及〈支那近世國粹主義〉這兩篇文章都收入於《支那學文藪》。《支那學文藪》原在1927年，狩野60歲的時候，狩野親自精選、編輯過去發表的論文或演講稿而由弘文堂出版的。該書在1973年補充其他在舊版中沒有收錄狩野於1928年之前發表的短篇文章或演講草稿，並重新由みすず書房出版。

〈關於支那學研究的目的〉一文是，狩野1924年在第三高等學校支那學會演講時的演講草稿，嗣後收入於新版的《支那學文藪》。因為是演講的草稿，因此後半部只是綱要條列式的指出要點，並沒有具體地詳細講述，無法窺知演講的整體內容，但狩野在這一篇文章中，非常清楚地開展如上所述他所推動新的中國學研究的方法及觀點。首先狩野指出「漢學」與「支那學」(中國學)在名詞定義上的差異，他將「支那學」認定為與西方學界所謂“Sinology”，意即以中國(支那)為學問研究的對象，從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等各種角度來探討在中國產生的文化這種學問。接著談到研究中國學的目的，根據法國的中國研究的例子，提出「將中國視為世界文明之一，從純學術的角度來研究它」的態度。

另外一篇〈支那近世的國粹主義〉分為兩節，第一節是刊登於《藝文》第2年第10號(1911年7月)，第二節則是刊登於《藝文》第3年第1號(1912年1月)。據文章最後的說明，第二節係在京都

帝國大學主辦的夏期講習會上演講的紀錄。這篇文章主要探討在中國「國粹主義」如何產生？且在當代清末的教育、學制、刑法上引發何種影響，以何種形態來展現出來？等問題。狩野在這一篇文章中除了探討「國粹」這一詞彙、概念的來源以及傳播過程之外，更進一步地提及並且分析當時在日本創造的新漢語詞，亦即當時中國所謂的「新名詞」如何傳入中國，產生何種反應這一問題。根據狩野的介紹，光緒二十九年（1903）發布的《全國學堂總要》中提到「新名詞」流行的問題，在該《總要》中，「新名詞」如下分類而加以批判：

1. 卑俗而不雅馴者：「國體」、「國魂」、「膨脹」、「舞臺」、「代表」等。
2. 在中國向來並非未使用，但意義不同者：「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運動」等。
3. 義雖可解，但並非必須此字者：「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

狩野提供的這些訊息，在觀念史研究或關鍵詞研究上相當有助益，因此，本篇文章從觀念史研究或關鍵詞研究的觀點來看也具有豐富的學術價值。此外，狩野所生長的時代恰逢清末時期，他得以親自觀察清末的中國，並且與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等中國學者實際交流往來，在這篇文章中他所提供的清朝當時的學制、刑法等相關訊息，非常具可靠性及學術價值。